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性建构

——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1927—1936)

邹欣星

(中共西安市委党校 文化教研部,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曾映证并推动了民国西北开发思潮的形成,也曾为现代中国建设思想的传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大公报》新闻传播、经营管理策略,《大公报》与1930年代社会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少数学者涉足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与1930年代西北开发、西北社会发展研究,但目前仍较少有人关注到当时《大公报》新闻叙事与西北开发思潮的兴起,以及现代中国思想传播的关系。

关键词:西北纪实;现代中国;《大公报》;西北报道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4-0056-06

与《申报》和《新闻报》的商业化、大众化办报取向不同,天津《大公报》沿袭了中国“文人论政”的精英化办报传统,不仅成为中国报业史上声誉卓绝的“长寿翁”,也因此而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少数民营报刊的成功典范之一。因此,对天津《大公报》的研究历来不乏其人。现以“大公报”为主题搜索中国知网,可查找到相关论文两千六百九十余篇,其中2000年以后发表的论文约一千八百多篇,占全部研究成果的百分之七十。从当前研究成果所关注的对象来看,虽然包括长沙《大公报》在内的各个不同时期的《大公报》都有成果面世,但被关注最多的仍属20世纪30、40年代的天津《大公报》,这既得益于这一时期天津《大公报》在当时中国大众媒体、公共舆论界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史上的地位,也得益于它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大影响力。1930年代作为天津《大公报》发展黄金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研究者众。只是1978年以前大陆相关研究主要以“小骂大帮忙”等政治立场的批判为主,研究视角相对单一。在改革开放后,研究方向开始由单极转向多元,研究者们试图以更客观、理性的态度评判其历史价值。从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来分类,其研

究现状大体可以概述如下。

一、《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现状

1.《大公报》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

从文学角度研究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者多以文学副刊为对象,以此透视大众媒体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关系。较早开始这方面研究的是曾任《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的萧乾,他于1979年1月在《读书》上发表《大公报文艺奖金》^[1]一文,回忆《大公报》对于当时中国文学活动的参与和促进作用。同年2月又于《新文学史料》上发表《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以此阐述《大公报》文艺副刊对于新文艺运动的意义。^[2]自此以后,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与中国文学关系研究的成果便续有呈现,相对比较成熟而成体系研究的是刘淑玲教授,她以新记《大公报》文学副刊发展脉络的梳理为经线,各个时期文学副刊主编所坚持的编辑原则、文学创作倾向和因之而出现的各类文学现象为纬线,分析了30、40年代天津《大公报》对文学独立性的强调,对作家个人身份自由的重视,并认为作为现代传播媒介存在的新记《大公报》拓宽了中

收稿日期:2019-08-22

作者简介:邹欣星(1981—),女,湖南涟源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媒介文化。

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空间,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领域。^[3]

此后对于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与文学关系的研究基本上都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只是具体研究角度各有分野,比如:江南以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为视角梳理1930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共相对应、分享共同社会思想资源的关系,揭示其作为自由主义文学标本的历史地位;^[4]陈啸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散文共生共荣的关系切入,分析“文艺副刊”对京派散文创作规范、美学旨趣与作家群形成方面的重要意义;^[5]曹万生则从1930年代《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着手,研究这一诗刊对于中国现代派诗歌发展的意义;^[6]沈卫威主要将《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1934)作为《学衡》的同路刊物来研究,阐述了其主编吴宓所宣扬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对中国白话新文学的批评和影响。^[7]真正进一步拓宽1930年代《大公报》与文学关系研究领域广度的是汤林峰,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后他便从比较文学的视角陆续展开《大公报·文学副刊》(1928—1934)与当时德国文学^[8]、英国文学^[9]、法国文学^[10]以及中国文学翻译之间关系^[11]的各种论述,也曾阐释过《大公报·文学副刊》与中国早期比较文学^[12]、中国传统诗歌文化认同的关系。^[13]

2.《大公报》新闻传播策略研究

从新闻传播角度切入研究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的学者,多以分析和探讨天津《大公报》在短短数年间从经营惨淡的地区小报华丽转身为畅销全国权威大报的成功经验为鹄的,期望通过此类研究为当代中国大众媒体和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较早新闻传播学领域展开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研究的是曾宪明,1994年他从广告传播视角对比分析了《申报》与《大公报》在20世纪20、30年代采用广告传播策略的异同,阐述了报纸广告如何完成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过程。^[14]十分有趣的是,目前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新闻传播与社会文化思想变迁宏观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的也是以《申报》与《大公报》互为参照的对比研究,主要研究者是唐小兵,他通过对“星期论文”和“自由谈”的对比研究,剖析了当时中国公共舆论空间呈现的特征,以及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公共舆论空间建立的关系。^[15]

比较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现立足于大

众媒体与社会发展关系视角,考察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新闻传播叙事的鸿篇论著,唐小兵的研究虽然以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为中心,但更倾向于以《申报》《大公报》社评建构的公共舆论空间来考察时代社会历史文化思想的发展与变迁。故而,当前从新闻传播角度开展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研究的,多具体细节论述之作,如张丽萍^[16]、张显^[17]从文人论政、“四不”原则分析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本质和其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成功实践;方汉奇^[18]、周葆华等^[19]对《大公报》“小骂大帮忙”政治态度的评价表示质疑;罗国干^[20]、孙宏等^[21]则从媒介管理经营的角度探讨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成功的经验;还有李桂生^[22]与徐有威等^[23]研究过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对抗战舆论的准备和对匪患的社会反应。

当然,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对于中国新闻发展史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从地区小报迅速发展壮大成全国优秀大报成功经验的借鉴,更因为其在新闻实践中为新中国新闻事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因此,当学界回溯中国新闻从业群体的成长轨迹,或者关注研究现代优秀新闻从业者时,总不可避免地需要回到1930年代的天津《大公报》。故而,学界还涌现了大量新闻从业个体与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关系的研究成果,如:《张季鸾与〈大公报〉》^[24]、《徐凌霄与〈大公报·戏剧周刊〉》^[25]、《徐铸成与〈大公报〉》^[26]、《萧乾与大公报的“小公园”》^[27]等。特别是对范长江及其新闻报道做研究时,研究者通常无法回避他在1930年代为天津《大公报》撰写的各类旅行通信,这方面研究不仅起步十分早,^[28]也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天津《大公报》是一个以纪实为基本报道原则的新闻媒介,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千信息的史料库。因此,也有较多学者从历史的角度,以媒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新闻报道文本的分析来透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思想的变迁。较早展开这方面研究的是吴廷俊,他比较侧重于史学视角,曾花四年时间通读新记《大公报》全部报道,并广泛搜集《大公报》史料和回忆文章,于1994年撰写了《新记大公报史稿》。

之后,以整体系统的宏观视角,研究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关系变迁的是

贾晓慧、段彪瑞、岳谦厚、孙会等人。贾晓慧的研究,以尽量抛开对天津《大公报》政治立场、价值评价的研究旧见为原则,尽可能探索《大公报》价值立场的客观中立取向,以此研究“九·一八”后天津《大公报》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29]段彪瑞、岳谦厚则主要是以天津《大公报》对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发生的重要历史事件的报道和社评为文本,探讨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生活的情状。^[30]孙会则更多的是从广告经济学角度切入研究 1902 年至 1936 年间天津《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以及生活内容转变之间的关系。^[31]

在具体报道微观考察方面还有:陈廷湘以 1928—1937 年天津《大公报》等报刊为对象研究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32]任桐以天津《大公报》关于和平裁兵的言论来研究其民本主义价值取向;^[33]李桂生研究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与中国近代化浪潮的交互影响;^[34]雷承锋通过对 1926—1937 年天津《大公报》广告的研究,探析当时天津社会生活的变迁;^[35]侯杰则主要以《大公报·家庭与妇女》副刊为研究对象,剖析其对五·四以后女性形象和气质塑造的影响。^[36]

相对于文学、新闻传播视阈中的《大公报》研究而言,史学、社会学视角下的天津《大公报》研究成果论著较为丰富,而论文相对比较匮乏。现有论文大多关注早期《大公报》与晚清、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关系,较少研究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与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并且,现有这类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将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报道当成一种静态存在。实际上,当时天津《大公报》各类报道本身就是当时众多社会文化力量博弈的结果。如果能透过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力量博弈的状态,以一种动态的视角去研究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文本叙事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会使研究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二、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述评

相较于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相关研究的火热局面,在大众传媒视阈下,以报刊媒体与 1930 年代西北社会发展关系为切入点审视《大公报》西北报道的研究,显得尤为单薄。因此,有关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如何通过西北报道的新闻叙事,推动西北开发思潮的发展,以及建设现代

中国思想的广泛传播的研究则更显薄弱。

较早而又比较系统地关注文字书写与 1930 年代西北社会开发的是胡大浚,他主编了《西北行记丛萃》,将在当时社会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十册西北旅行记述点校整理,2002 年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不过真正以研究的角度开展对西北著述考察的是尚季芳,2003 年,他曾针对 1930 年代各类西北考察家的西北著述对当时人们认识西北、开发西北所起到的先导作用进行了细致阐述。^[37]

总的来说,目前关于 1930 年代大众媒体与西北社会发展关系宏观研究方面尚无专著。只有宗玉梅比较早注意到了大众媒体与西北社会发展的关系,但她认为虽然 1930 年代众多有识之士纷纷通过报刊等媒体登载开发西北的文章,以研究西北、宣传西北,制造舆论推动国民党政府的开发西北计划,但其实效却有限。^[38]而持相反观点的是刘海燕和彭凌春,刘海燕以 1930 年代记者、学者、政府要员等人建构起来的公共舆论空间为载体,阐述了大众媒体对新疆成为当时西北开发热潮重心所起到的推动作用。^[39]彭春凌则从报刊媒体与西部中国的建构^[40]这一十分新颖的角度,阐释了 1930 年代报刊叙事与人们对西北社会认识的彼此互构关系。^[41]

而真正具体到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与西北社会的发展研究是贾晓慧,她曾经通过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对西北问题深入报道的分析,阐释了《大公报》从交通水利、吏治改革、禁种鸦片、科学利用西北资源、恢复农业生产、培养西北人才等方面实现西北整体开发设想的当代意义。^[42]但目前就整体研究而言,尚无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出现。当然除上述相对成系列的著述与论作之外,学界对 20 世纪 30 年代天津《大公报》研究还有少量较少人涉猎的新颖之作,诸如新记《大公报》学术史述略,《大公报》与民国天津地区音乐研究、《大公报》写生画研究等。

三、西北“纪实”与现代中国的想象:大众传媒视阈下《大公报》西北报道研究

事实上,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国内媒体西北报道的大量涌现,固然与当时西北交通、住宿等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关,但更是缘于当时国家、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西北民族分裂活动的日趋猖獗,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迅速高涨,以及社会有关西北的

真实信息极度贫乏之故。而学界对这一时期新记《大公报》跨学科研究虽然也硕果累累,但总体而言以与文学学科的交叉为主,少有以大众传媒与社会共识凝聚,以及新闻文本生产内、外部文化力量交互影响的角度展开的研究。

综观20世纪中国百年历史,可以称之为努力使中国现代化的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与报刊则是文人知识分子民族国家想象建构的重要载体,作为当时中国报业巨头之一的天津《大公报》,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想象大潮中。并且,它也对20世纪上半叶现代中国、民族国家思想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而西北作为中国疆域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边防区域,历代以来一直备受中央王朝的重视。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了加强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力,削弱军阀在地方的影响力,提出了编遣裁军的主张。当裁兵安置成为一个突出而迫切的社会问题时,西北携以地广人稀、物源丰厚的优势进入了时人视线。但对当时尚未失去东北的中国而言,西北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尚难称举足轻重。因此,相对于其他报刊媒体而言,此时天津《大公报》虽对西北议题显得极为关注,不过报道内容也多以裁兵引发的移民垦殖为主,大体难脱历代以来西北研究所关注的移民实边、移民垦殖的范围。西北既不能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天津《大公报》对西北议题的关注,亦不可能在全国引起较大范围的反响。

直到1931年东北沦陷,国土尽失,1932年上海“一二·九”事变使南京可能遭遇兵临城下的危局,西北对于中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意义才得到了彰显。在1932年以前西北研究专刊仅四种,1932年以后各类以西北研究为中心的刊物相继出现,多达十五种,然而相较于天津《大公报》自1928年西北大灾开始,以社论与新闻报道相互映照的方式关注西北、倡导开发而言,这些刊物对西北问题的关注要晚得多。并且1932年前后创刊的这十数种西北专刊,除《西北论衡》外,其余发刊持续时间均十分短暂,很难形成平稳而系统的印象。而天津《大公报》对西北的关注则一直持续到抗战爆发后西南建设时期才告结束。这种持续性的关注十分有利于建构一个相对稳定的西北形象。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天津《大公

报》因为经营有方,社会影响力日益昭显,再因其长时间以来对于“西北”议题的关注,终是成就了它在公共舆论领域“西北”话语的引领者身份。

1930年代前后,天津《大公报》曾刊载过的旅行通信数量巨大,所涉地域遍及大江南北,与西北相关的新闻、社论等各类报道也数量不菲。但从1930年代天津《大公报》发行状况和社会反响的考察来看,为它赢得巨大社会声望的两个栏目是社论和旅行通信(也称为旅行通讯或旅游通讯)。叶浅予曾回忆道:“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那些年,《大公报》有两个专栏最能吸引读者:一个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一个是赵望云的‘农村写生’”。^[43]而范长江旅行通信的典型代表作是西北旅行通信。1935年前后,他曾在天津《大公报》连载了自己曾以亲历者身份撰写的西北旅行通信。他以纪实报道的方式,呈现了深处中国腹地的西北,不仅仍处于“前现代”农耕时代,在更为偏远的边疆甚至还处于比农耕文明更久远的游牧时代。

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一败再败,不断以割让港口城市的各种权益为代价获取了一息之宁。迄止1930年代,在殖民者主导,中国内地许多城市大多数都建设了具有一定“现代化”的公共设施,国人在“现代文明生活”中感受到了便利的同时,也在这种颠覆以往全部历史经验的陌生世界里感觉到了无所依恃的惶恐。而以范长江西北报道为代表的《大公报》西北旅行通信,所提供的这种“农耕西北”印象,其种种似曾相识,让读者在痛感荒凉落后的同时,又能感知到难以剥离的历史延续感和亲密感。如此,报刊媒体所提供的文本西北,与东部社会现实的对比,恰恰成为一组活生生的“标本”。既印证着当时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改造“野蛮”中国建立“文明”中国的合理性,也证实了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从这个意义而言,20世纪30年代天津《大公报》西北旅行通信对当时中国社会现代化思想的发展,以及不久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确实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

但从上述文献综述分析可以探知,1930年代西北社会具体问题研究者较多,但从文化方面着手,探讨大众媒体与西北开发以及“西北”概念形成的研究较少。天津《大公报》与西北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更是尚处起步阶段,虽然已经得到了一些关注,但其研究成果仍极为有限,仍有较大研究空间。同时,目前学界对1930年代天津《大公

报》与文学关系的研究,仍较多关注天津《大公报》作为文学作品传播中介之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而较少从逆向的角度思考深植于中国社会文化思想领域骨髓的文学思维习惯、文学叙事模式,如何通过文人的新闻叙事影响着当时正在发展成熟的中国现代新闻叙事。并且,与同一时期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及其他新闻报道类型研究相比,对《大公报》旅行通信的研究也相对要冷清许多,更不用说将 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西北旅行通信当成一个独立整体文本,以旅行通信文本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文体特殊性的视角切入,宏观研究西北旅行通信对于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和意义。

事实上,20 世纪 30 年代天津《大公报》的西北旅行通信,一方面因为文本叙事对叙事者亲历经验和新闻叙事客观性的强调,使文本“西北”的呈现具有一定纪实性;另一方面,又因为文本叙事对文学叙事情感本质的征用和文学叙事方式的借用,使文本“西北”形象的建构成为当时文人知识

分子现代中国想象的一种表征,寄寓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关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理想和预期,反映了他们在社会剧烈变革之际对国家与民族安危思考的焦灼感。从这种意义上而言,1930 年代天津《大公报》西北旅行通信的纪实,其实是另一种方式的文本想象,这种想象是在当时中国社会现代化追求的支配下展开,服务于当时社会渐次高涨的现代中国想象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历史也许有时会发生跳跃性的裂变,但绝不可能与过去一刀两断,任何断裂之间都有各种连续性的因子,以赅续历史的不断发展。”^[44]通过对 20 世纪 30 年代天津《大公报》西北旅行通信的研究,不仅可以揭示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中如何重新思考作为边疆的“西北”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关系,对“现代”中国建构的理想和预期;还可以透视当时中国报刊媒介在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为今天中国大众传媒如何更有效地传播国家文化、塑造国家形象提供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肖乾. 大公报文艺奖金[J]. 读书,1979(2):114-115.
- [2] 萧乾. 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J]. 新文学史料,1979(2):132-147.
- [3] 刘淑玲. 《大公报》与中国现代文学[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203.
- [4] 江南. 从三十年代《大公报》“文艺”副刊看京派文学[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116-123.
- [5] 陈啸.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散文[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5):18-29.
- [6] 曹万生. 一份不应忘记的现代派重要诗刊——论《大公报·文艺·诗特刊》[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1):167-176.
- [7] 沈卫威.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新人文主义的张扬[J]. 社会科学辑刊,2000(2):142-147.
- [8] 汤林峰.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98-102.
- [9] 汤林峰.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英国文学研究[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5):35-39.
- [10] 汤林峰.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法国文学研究[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30-134.
- [11] 汤林峰.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文学翻译研究[J]. 湖南社会科学,2013(5):60-63.
- [12] 汤林峰.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中国早期比较文学[J]. 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34-38.
- [13] 汤林峰.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认同[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107-110.
- [14] 曾宪明. 《申报》、《大公报》1925-1935 十年间广告手法评析[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2):64-68.
- [15] 唐小兵. 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34.
- [16] 张丽萍. 新记《大公报》:从“文人论政”到“新闻专业主义”[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98-102.
- [17] 张显. 新记《大公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践行及其启示[J]. 江西社会科学,2013(4):246-260.
- [18] 方汉奇. 为《大公报》辩诬——应该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J]. 新闻大学,2002(3):58-59.
- [19] 周葆华. 质疑新记《大公报》的“小骂大帮忙”[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3):60-69.
- [20] 罗国干. 新记《大公报》的经营管理——媒介经营管理研究之三[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63-68.

- [21] 孙宏.《大公报》的“三驾马车”[J]. 新闻出版交流,2003(2):52-54.
- [22] 李桂生.《大公报》与抗日战争的舆论准备[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1):101-106.
- [23] 徐有威,吴乐扬.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J]. 江海学刊,2012(5):176-184.
- [24] 盛沛林.张季鸾与《大公报》[J]. 新闻爱好者,1994(10):41-42.
- [25] 乔丽.徐凌霄与《大公报·戏剧周刊》[J]. 戏曲艺术,2007(2):71-76.
- [26] 李伟.徐铸成与《大公报》[J]. 中国编辑,2005(6):91-93.
- [27] 黄雅玲.萧乾与大公报的“小公园”[J]. 新闻爱好者,2008(10):40-41.
- [28] 傅继馥.高西北第一幅解剖画——读范长江的通信集“中国的西北角”[J]. 新闻业务,1957(6):49-51.
- [29] 贾晓慧.《大公报》新论——20世纪30年代《大公报》与中国现代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99.
- [30] 段彪瑞,岳谦厚.媒体、社会与国家:《大公报》与20世纪初期之中国[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3.
- [31] 孙会.《大公报》广告与近代社会(1902—1936)[M].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247.
- [32] 陈廷湘.1928—1937年《大公报》等报刊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J]. 近代史研究,2006(3):23-40.
- [33] 任桐.论《大公报》和平裁兵言论的民本主义倾向[J]. 史学月刊,2002(6):63-67.
- [34] 李桂生.中国近代化浪潮下的《大公报》[J]. 探索与争鸣,2008(7):65-67.
- [35] 雷承锋.《大公报》广告(1926—1937)与天津社会生活变迁[J]. 现代传播,2013(5):46-50.
- [36] 侯杰.《大公报》副刊《家庭与妇女》对五四以后女性形象和气质塑造[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60.
- [37] 尚季芳.国民党政府时期的西北考察家及其著作述评[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3):106-113.
- [38] 宗玉梅.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与西北开发[J]. 史学月刊,2003(5):54-58.
- [39] 刘海燕.20世纪30年代报刊媒介视阈下的新疆[J]. 新疆社会科学,2011(1):137-140.
- [40] 彭春凌.抗战前夕大众媒体的西行记[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1):230-249.
- [41] 彭春凌.“另一个中国”的敞开——大众媒体的西部行记(1935—1937)[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152-159.
- [42] 贾晓慧,华道云.《大公报》与20世纪30年代西北开发[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2):7-13.
- [43] 叶浅予.中国画一代闯将[J].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七辑——国画大师赵望云[M]. 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89.
- [44] 李细珠.关于晚清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一点思考[C]//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2002年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2.

Northwest "Documentary" and the Imaginativ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a

—— Research on the Northwest Report of Ta Kung Pa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Media(1927—1936)

ZOU Xinxing

(Ministry of Cultur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the Xi'an Committee of C. P. C.,
Xi'an Shannxi 710054,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Tianjin Ta Kung Pao witnessed the form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ern in China, and it also played a huge role in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modern China conception. However, the current research mostly focu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 Kung Pa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a literature, the news communication of Ta Kung Pao, the management strategy of Ta Kung P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 Kung Pao and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1930s. Although a few scholar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Ta Kung Pao" and the Northwest Development in the 1930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ss media, there are still few people concerned about the rise of the news narrative of the Ta Kung Pao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western China, as well as the spread of modern China conception.

Keywords: northwest documentary; modern China; Ta kung pao; northwest reported

(责任编辑:沈建新)